

江苏儿童文学四十年(1978—2018)

姚苏平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江苏儿童文学获得了长足发展,既有整体趋势的变化,也有作家代际间的差异。新世纪前后是江苏儿童文学发展的分水岭。1978年—2000年,江苏儿童文学作家艺术经验生成的重要路径是童年回忆与江苏地域特色的情感融合,将儿童形象的书写上升到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高度,并把儿童生活投射在对自然万物的关注上。新世纪前后,江苏儿童文学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黄金期,年轻作家大规模的出现。观念的转变和文本的变迁主要表现为从儿童日常生活、实际境遇以及历史文化等视角表现童年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提升幻想类题材作品的品质。

关键词 江苏儿童文学 叶圣陶 黄蓓佳 曹文轩 王一梅

姚苏平,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副教授 210036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是以叶圣陶创作的童话集《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等作品为起点和标志的,这也是现代江苏儿童文学的开山之作。此外,教育家陶行知、中国学前教育创始人陈鹤琴等均对江苏儿童文学的健康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共同构建了江苏儿童文学扎根本土、关注现实、尊重儿童的坚实基础。历经改革开放四十年,江苏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变化,既有整体趋势的嬗变,也有作家代际间的差异。新世纪前后是江苏儿童文学发展的分水岭:1978年—2000年期间,江苏儿童文学作家艺术经验生成的重要路径是童年回忆与江苏地域特色的情感融合,将儿童形象的书写上升到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高度;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黄金期。江苏儿童文学在传承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不断反思和拓展童年观念,全面提升艺术性和幻想性的品质,彰显了江苏儿童文学的艺术自觉和文化自信,生成了江苏儿童文学发展的新态势。

韦勒克提醒我们,在处理文学演变问题时,“时间并非只是整齐划一的事件序列,而价值也不能只是创新。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因为不管在任何时刻都会涉及到整个过去并且包罗一切价值。我们必

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儿童文学发展机制研究”(17ZWB005)阶段性成果。

须抛弃轻易得出的解决方案,并且正视现实中的全部具体浓密性与多样性。”^[1]因此,以新世纪为分界线也只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并不是截然的将前后时期隔裂开来。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作为“共性”的背景和动力下,江苏儿童文学发展能否有效呈现自身的品质?逻辑展开是否等同历史本然?这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复杂之处,也是探寻江苏儿童文学发展特色的迷人之处。

一、基本概貌

首先,对“江苏儿童文学”的定义,主要是从主题意蕴、地域文化和美学特征来概括的。就作家而言,除了活跃在江苏文坛的儿童文学作家外,还包括出生在江苏,并以故乡的童年生活经历、地域特色文化为创作资源、主题意蕴的作家。江苏儿童文学拥有一支“传帮带”意识强烈、不断壮大的创作梯队。新时期儿童文学发展阶段大放异彩的作家有刘健屏、黄蓓佳、程玮、金曾豪、丁阿虎、范锡林、方国荣、海笑、张彦平、赵沛、颜煦之、李有干、马昇嘉等;尤其是以江苏盐城的童年经历为创作资源和审美意蕴的曹文轩,尽管大学时代就离开江苏,但是他的文学成就与江苏的地域文化特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新世纪前后涌现出的青年作家群体,如祁智、王一梅、韩青辰、王巨成、庞余亮、曹文芳、韩开春、胡继风、徐玲、刷刷、顾抒、郭姜燕、巩孺萍、任小霞、赵菱、范先慧、顾鹰等,这批青年作家多数不是专业作家,有长期与儿童接触的生活经验,对儿童文学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是江苏儿童文学发展的中坚力量。

其二,江苏儿童文学为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观念转变、艺术探索提供了可贵的文本实践,对儿童文学的文类、题材、主题等作了全面的拓展。新时期伊始,江苏儿童文学作家很早就跨越了“呐喊加控诉”的伤痕文学模式,贴近儿童的生活和心灵,热情、自信地塑造时代变更中的儿童形象。程玮笔下少女形象充满青春活力、刘健屏的“小男子汉”系列为新时期儿童形象灌注了阳刚之气。这一时期的创作不断地转向“以儿童为本位”“以儿童为中心”的创作观念,提供了既有时代精神又充满哲理思考的“童年观”。作家们的艺术个性不断张扬,勇于探索表现手法的创新。《白色的塔》(程玮)的思辨色彩、开放式结局令读者耳目一新;《今年你七岁》(刘健屏)以独特的第二人称叙述方式,生成了别具一格的文本形态;《祭蛇》(丁阿虎)打破了将儿童文学视为教育儿童的直接工具的写作范式,演绎了一段乡村顽童“祭奠”死蛇的滑稽闹剧。韩青辰对报告文学的挖掘,巩孺萍对儿童诗歌的着力,金曾豪、韩开春等对儿童散文的经营,都体现出了中国儿童文学在文类探索上的新高度。

在题材和主题选择上,儿童的小世界与都市、乡村、时代、历史、自然全面交融。以小说为例,就有校园小说、成长小说、动物小说、探险小说、科幻小说、历史题材小说等。以特殊儿童、留守与流动儿童、文化旅行、动植物特性、自然环境、生态文明等为主题的作品日渐丰富。作家们越来越自觉地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展现儿童的主体性和童年生活的斑斓。与此同时,对读者接受的重视是儿童文学当代发展的重要表征。作家们在创作实践中更加自觉地依照幼年、童年、少年这三个年龄段儿童的心理特点、审美需求和欣赏习惯来创作。如颜煦之、王一梅、巩孺萍、杨海林等对低幼儿童故事、童话、诗歌的着力;顾抒、范先慧等人创作的玄幻、悬疑类作品对青少年读者群的影响。受篇幅所限,本文主要采用儿童小说和童话作为论证对象。

其三,在理论与批评方面,江苏学者金燕玉、谈凤霞等人不约而同地以“论从史出”的方式,全面梳理、条分缕析,更以跨学科的方式考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童年”想象。金燕玉的《论茅盾的儿童

[1][美]勒内·韦勒克:《文学史上的演变概念》,《批评的概念》,张今言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文学评论》《茅盾儿童小说初探》《茅盾的儿童文学翻译》《茅盾散文中的童年情节》《郑振铎〈儿童文学的教授法〉考评》等论文,通过文本细读、考镜源流的方式对现代文学名家的儿童文学创作,做了细致的梳理和考辨。在此基础上生成的《中国童话的演变》《童话幻想的起源》《民国时期的儿童文学报刊》《30年代兴起的科学童话创作》等论文,以及专著《中国童话史》,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史做了深入的钩沉和论证。谈凤霞的博士论文《“人”与“自我”的诗性追寻——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回忆性童年》以“五四”至今的现代回忆性童年书写为研究对象,全面系统地考察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对童年生命的发现进程与收获,并进而探讨这类文学书写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儿童文学的特殊意义。她的《幻想与娱乐双翼的负重双飞——论“十七年”主流话语边缘的儿童电影》《论“文革”时期战争题材儿童片的美学成就》《历史苦难的边缘性诠释——“文革”背景的童年叙事考察》《论“文革”童年叙事的代别症候——兼与“红卫兵——知青”视角的“文革”记忆比较》《喧哗与骚动中的成长危机——论“文革”童年叙事的人文反思》等系列论文较为全面地考察了“文革”时期儿童文学的形貌特质。此后,谈凤霞对儿童幻想小说、儿童戏剧、儿童图画书、儿童电影等多种文类与媒介形式的辨析,都表现出了当代青年学者的丰赡学识和探索能力。此外,江苏儿童文学研究者也敏锐于国际交流视域下的专业拓展,如金燕玉的专著《美国儿童文学初探》、谈凤霞的论文《论英国当代少年战争小说的美学深度》《认同危机中的挑战——论当代美国校园小说对少年主体性的建构》,笔者论文《美国的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述评》《儿童文学评奖机制的美中比较研究——以纽伯瑞儿童文学奖与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为例》等,都有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生成了合适的研究方法和批评语言,丰富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理论和方法。

此外,丁帆、汪政、何平、金燕玉等专家对江苏作家黄蓓佳等名家创作给予了持续的关注。对曹文轩作品的研讨集结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的核心群体,如王泉根、朱自强、孙建江、李利芳、徐妍、李东华、谈凤霞、赵霞等人从中西方儿童文学风格比较、“儿童性”的特质、中国儿童文学的世界传播、作家的审美选择等多个角度对其作品做了充分的研究。郁炳隆、刘静生所著的《江苏儿童文学10家评传》(1993年),对程玮、刘健屏、方国荣、颜煦之、丁阿虎、范锡林等活跃于20世纪80—90年代的江苏儿童文学作家做了“知人论世”式评传,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金燕玉的论文《江苏儿童文学50年发展之回顾》,对1949—1999的江苏儿童文学发展,按文革前17年、文革后20年、四个年龄梯队,对江苏儿童文学作了全面的回顾。笔者论文《当下、原乡和想象——论祁智的儿童文学创作》《性别话语与身份意识——论韩青辰儿童文学作品的叙事策略》《与成长同行——王巨成儿童文学创作论》对活跃于江苏文坛的青年作家做了较为及时和深入的批评。总体而言,当下对江苏儿童文学作家作品、乃至全国很多原创儿童文学作品的研究,较多地停留在阅读推广层面。通过理论话语实践与当下文学现象对接,探究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儿童文学的独立性、江苏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1978—2000年:艺术探索的觉醒与开启

新时期伊始,“儿童文学教育论”和“儿童文学审美论”两种文学观念与创作实践此消彼长。很多革命题材的儿童小说的出现是“十七年”至“文革”时期文学创作的积压和延续。如海笑的长篇小说《红红的雨花石》《石城怒火》、中篇小说《小兵的脚步》,张彦平的长篇小说《烟笼秦淮》《青春从这里开始》等,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小英雄”“小战士”式的主题叙事模式。但总体而言,在肯定教育和认知功能的基础上,儿童文学对“文学性”的回归,对“人性”的挖掘,得到了一再的张扬和不断的放大;儿童本体的心理、情感活动,以及儿童自我反思的意识和能力,通过童年回忆、地域文化的审美叙事,得到了全面的肯定和郑重的书写。1978—2000年的江苏儿童文学主力军为

程玮、刘健屏、黄蓓佳、金曾豪等。他们的作品总体上表现出对乡土童年回忆的热衷,对现实的关切,对儿童成长所指向的“未来民族性格”的美好期盼。体裁以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为主,题材和人物多为6-16岁未成年人的成长故事;创作方式上是一种“激情”而又“自信”的现实主义,充满了思辨性的诗意。曹文轩在乡土叙事中的童年回忆,逐渐走向了审美的偏至;金曾豪以“丛林法则”的方式所塑造的动物形象,呈现出冷峻的“生态美学”。他们对遣词造句的斟酌、文风意蕴的经营,呈现出独特的创作实力和美学风格。

1. 儿童主体性的再发现

在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中,在“人”的发现的过程中,“儿童”的价值被一再挖掘。江苏儿童文学在新时期伊始为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时代提供了新人物、新主题。刘健屏笔下不盲从的章杰、程玮笔下青春动人的“少女的红发卡”等,创造了昂扬乐观的国家未来接班人形象。正是通过文本之内的美学形态和文本之外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张力,构成了这些形象的经典性意义。

刘健屏创作了《我要我的雕刻刀》等短篇小说,《初涉尘世》《今年你七岁》等长篇小说,为新时期江苏儿童文学的创作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无意去展示时代痼疾带给儿童的“伤痕”,而是以治病救人的态度抨击了时代症候下儿童的无知与盲从,刻意强调了独立思考的意识和能力;他耐心细致地刻画了新时期的儿童形象。他们不再是完美无缺、忠贞烈骨的“小英雄”“小战士”,而是与新时期百废待兴同步成长的有血有肉的孩童。刘健屏尤擅于对他们的怯懦、顺从、顽劣、撒谎等问题做“心灵辩证法”式的剖析,并通过儿童自我反思的“过程性”完成精神洗礼。他用“雕刻刀”来雕刻民族性格,不遗余力地召唤“小男子汉”们撑起民族的未来。在《今年你七岁》中,他以父亲的独特视角深情又理性地记下儿子刘一波七岁的生活点滴,以健笔写柔情。当自己所秉承的“雕刻”男子汉的目的与现实生活中的无奈发生齟齬时,塑造“男子汉”的时代话题终成为未竟之业。刘健屏擅长对人物心理变化作全景式剖析,塑造极富个性的人物形象,在新时期的儿童文学天地中发出了铮铮之声。

新时期伊始,程玮的许多短篇作品就显现出儿童活泼泼的自然天性。《See You》《来自异国的孩子》首次涉及到对外开放语境下中西文化的冲突带给儿童的困惑。作品通过成人与儿童感受的差异、儿童们的“众声喧哗”,使得中外文化价值观得以更立体、丰满的呈现。《今年流行黄裙子》《彩色的光环》《镜子里的小姑娘》《哦,不,不是在月球上》《小溪从心中流过》《鸡心项链》《少女红衬衣》《少女红发卡》《少女红围巾》等作品将青春期少女特有的生理、心理特征细腻真挚、轻松自如地描写出来。她尤擅于通过“对话”来凸显儿童与成人、儿童之间、中西差异、古今变化、情感与理智的冲击和融合。少女成长的意义彰显为一个能动的量变与质变的过程,在“觉醒与压抑”间充满了张力,而不是凝滞、板结为一个仪式、一种程式。正如赵园所言:“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少女的成长经历是生命历程中最无色彩的一段,我们有意地跳开它,而这段生命中却充满觉醒与压抑,可作为生命全部行程的缩微形式。”^[1]程玮的少女主题小说在当代儿童文学中独领风骚,将其放置于整个当代文学的场域中也是自成一家的。

2. 乡土叙事中的童年回忆

自古江苏钟灵毓秀、人文鼎盛,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对过往时空的关切,构成面向乡土、铭刻着作家本人强烈印记的“童年历史”写作。童年回忆作为一种创作资源,一种生命和精神的源头,向人们展示了它独特的魅力。地域特色与童年回忆的情感融合,是江苏儿童文学作家生成艺术经验的重要路径。斯东·巴什拉在《梦想的诗学》中曾言:“童年如同遗忘的火种,永远能在我们的心中复

[1]赵园:《试论李昂》,〔沈阳〕《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5期。

萌。”^[1]儿童文学作家的乡土回忆往往是从自身的童年回忆起步的,比如曹文轩的苏北盐城“油麻地”“大麦地”,金曾豪的江南水乡,黄蓓佳的“‘芦花飘飞’的江心洲”“青阳城”“仁字巷”,李有干的盐城“大芦荡”,祁智的靖江“西来镇”,曹文芳对“石家村”“香蒲草”“栀子花”“紫糖河”的诗意追寻……既有江苏地域“百里不同风”的地域特色,也有历经者的共同回忆,如不约而同出现在曹文轩、黄蓓佳、祁智笔下的芦花鞋、芦根、芦荡,以及饥荒与贫乏带来的乡村样貌。他们对土生土长的地域文化的稔熟和热衷,以散文笔调或意识流的方式描摹地方性、流变性和碎片化的童年生活,拼贴出了地域特色多样、乡土风格多元的童年景观。

尽管曹文轩早就远离了苏北农村,人生更多的时光是在北京、大学校园中度过,但是这些时刻裹挟、影响他的都市浮华、校园气象几乎在他的文本中难见踪影,他的众多作品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童年、故土。他所回避的当下与所坚守的“童年”,既是他写作的视角、立场,也是境界和品格。正如曹文轩《乡村情结》中写道:“二十年岁月,家乡的田野上留下了我斑斑足迹,那里的风,那里的云,那里的雷,那里的苦难与稻米,那里的一切,皆养育了我,影响了我,从肉体到灵魂。”^[2]故乡给予曹文轩的,不只是素材和经验,还有灵魂和气质。其中最能够代表曹文轩文学成就和审美趣味的作品,是他以自己的苏北农村童年生活经历为素材创作的《草房子》《红瓦黑瓦》《细米》《青铜葵花》等长篇小说,《甜橙树》《红葫芦》等中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曹文轩构建了独树一帜的文本:中国当代乡土叙事下的诗性童年生活。它指向了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质匮乏、精神贫乏的“中国童年”景观。曹文轩的作品承接了鲁迅《故乡》《社戏》中水乡童年的生命原初体验,创作出桑桑、纸月、林冰、细米、青铜、葵花等数个生动的当代儿童形象。他从生命哲学的苦难意识出发,以志存高远的大手笔写儿童,以赤子之心的儿童立场写人生,以唯美而伤感的美学追求创造“艺术形式”。通过对特定年代苏北农村童年生活苦难而不乏精彩、忧郁而不乏趣味的书写,曹文轩不但承接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土叙事、诗性小说,更向世界讲述了儿童目光中的“中国故事”。

金曾豪出生于江苏常熟练塘的中医世家。江南水乡的氤氲、书香门第的熏陶,使得他的作品问世之初即有较高的起点。使其声名鹊起的《小巷木屐声》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文学的气息,“黄簪壳,青竹蔑,一黄昏编只小斗笠。蒙蒙雨,雨蒙蒙,雨打斗笠淅沥沥……”,呱呱哒哒的木屐声透着作家独特的乡土气息从小巷深处自远而近,童年意趣与传统民族特色交相辉映。在散文集《蓝调江南》以及少年小说《秘方 秘方 秘方》《绝招》《幽灵岛》《芦荡金箭》《青春口哨》等作品中,他非常乐意捡拾出苏南地区的种种俗语、童谣、农谚、顺口溜、乡间小调,以及与之相关的民风民俗、家长里短、约定俗成,这些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吴地风情。江南气韵也孕育了无数有风骨的人物:独具特色的“小娘舅”们《青春口哨》《迷人的追捕》《七月豪雨》《阳台上的船长》等)、孤清而善良的三娘(《有一个小阁楼》)、抗日小英雄金瑞阳(《芦荡金箭》)。可以说,“江南中的童年”不仅是金曾豪文学创作的特色,更是他的重要主题,并成为他心灵栖息之地、文笔寄托之处。

3. 儿童与动物、自然万物

对于新时期以来的动物小说,金曾豪的创作具有开创意义。他打破了“小白兔”“大灰狼”式简单的呈现,放弃了对动物肤浅的“拟人化”的处理方式,而采用“上帝视角”(金曾豪语)平等看待众生万物,以敬畏自然的姿态书写大自然中的动物,反思人类对动物世界的掠夺和侵占。对于儿童读者而言,既是生动的自然生态课程,还能从动物小说中感悟到生存、竞争、暴力的沉重。《狼的故事》《苍狼》

[1][法]斯东·巴什拉:《梦想的诗学》,刘自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9页。

[2]曹文轩:《〈细米〉代后记》,[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版,第243-244页。

《鹤唳》《绝谷猓猓》《凤凰山谷》等作品中塑造了孤独的狼、狷介而忧郁的狐狸丹丹、带领结的鹅、有情有义的警犬拉拉、悲情的相牛、逐渐野化的母猪“别克”、不断寻找家园的猓猓、优雅的黑、可爱的小鹿波波、芳烈的骏马贝贝、英雄迟暮的老鹰等形态各异的动物形象。它们有着逼真细致的野外生活习性、“丛林法则”残酷环境中的坚强意志力,以及“不自由,毋宁死”的刚烈性格。金曾豪的创作时而充满欢愉的浪漫,时而充斥残酷的冷静,时而迸发疯狂的野蛮。在《凤凰山谷》中,金曾豪调动了既往的写作经验,对凤凰山谷的生态体系做了全景式的描绘。以凤凰山谷的生灵万物为喻体,来比喻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动物、人类、自然万物通过这种隐喻方式整合起来,清晰地凸显出人与自然万象间的血脉渊源,从而生成了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美学品格。在多篇小作文末,对生态伦理的理性认同和情感迁移,被较为突兀的现代化进程瞬间摧毁。这一文本实践沿袭了金曾豪创作的惯常思路:为一个决绝的姿态而刻意设置了他笔下的人物命运。

动物小说对于儿童文学而言,既是重要的创作资源和文学意象,也是一种儿童精神,指向“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未来。如何在人类与自然、文明与生态的复杂纠葛中重思“动物”“自然”“生态”之于儿童的当代意义,构建其作为儿童文学精神的独特价值,仍是一个充满难度的课题。

二、2000 以来:表现儿童现实存在的广度和深度

新世纪前后,年轻作家大规模的出现,包括重返儿童文学创作的黄蓓佳、程玮。她们的创作不同程度地表现为宏大叙事的退场,将目光更多地投射在儿童的实际生活中。比如黄蓓佳《我要做好孩子》传达出对教育体制重压下儿童身心状态的忧虑和无奈,曾经洋溢在《小船,小船》《芦花飘飞的时候》中的诗意已消弭在学习成绩不尽如人意的烦恼中。对儿童本体的关注带来了创作体裁的丰富,年轻作者开始活跃于儿童文学界,并多以童话、儿童生活故事为创作体裁。童话等幻想类体裁越来越多地成为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创作的主体,比如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2000年)江苏获奖者王一梅的短篇童话《书本里的蚂蚁》。同时,作家对读者期待的重视,加之童书市场的日益繁荣刺激了作家的创作取向,以市场细分为导向的儿童文学创作出现了低幼童话、儿童生活故事、校园小说、幻想小说等面向不同年龄段的作品。这既可能是一种勇敢的艺术探索,也可能是市场利益驱使。

1. 表现童年现实生活的广度

新时期伊始对童年生活的表现,多以中短篇小说的体量,片断式、切面式地表现儿童在校园生活、学习习惯、性格品质、伙伴关系、家庭生活、邻里社区等场景中的体悟和改进。“改正缺点”“消除误会”“加速前进”是这一特定阶段儿童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裂变、重组带来了当代“中国式童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短短四十年现代化进程对传统童年模式的“同一性”的颠覆;社会分层对城乡儿童生活及精神面貌的深远影响与重塑;不断变更的媒介文化对当代儿童的群体与个体的裂变式、代际式影响……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共时性地在这片土地上相生相斥,交互而杂糅地建构了当代“中国式童年”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因此,对学业压力、家庭变故、身心疾患、留守与流动的生活状态等当下儿童真实生活的热烈关注,逐渐成为江苏作家乐于开拓、全面涉及的新领域。

对当下儿童生活的高度关注、全面书写,既促成了作家的创作,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共鸣。黄蓓佳的《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涉及到应试教育背景下的儿童成长、评价标准和荣誉意识。《亲亲我的妈妈》讲述了抑郁、自闭的母子二人舒一眉和安迪之间小心翼翼地、由浅及深的交流故事。《你是我的宝贝》主角是唐氏综合症的孤儿贝贝。祁智《芝麻开门》以及此后被进一步扩容的《麻雀在歌唱》《猫头鹰逃亡》《蝌蚪会跳舞》《小金鱼飞翔》等系列,构建了以“大钟亭小学”为中心的儿童生活场景。在这一片与真实社会生活高度贴合的背景基础上,凸现了许多个性鲜明、辨识度很高的儿童。此

外,韩青辰的“小茉莉”女孩成长故事系列;王巨成的长篇小说《七个少女和一只白鸽》《震动》系列对初中生成长的记录;李志伟对“跑步运动”为主题的运动类题材的专注(《追逐风的孩子》);殷建红对当下苏州工业园区发展背景下儿童成长的书写(《十图桥》《千河镇》《百步街》);顾鹰对单亲家庭儿童的描述(《我是桑果果》系列)等等。中国儿童当下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江苏儿童在高强度的教育体制下的生活状态,被全方位的书写;当代儿童作为独立的人格主体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其个体情感得到了充分的关照。儿童的主体位置被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写作高度,这是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普遍的写作趋势。

对农村儿童生活的关注,日渐成为江苏作家的写作热点。黄蓓佳《余宝的世界》关涉到城市流动儿童的成长状态。徐玲的《流动的花朵》讲述了王弟、姐姐王花随农民工父母进城求学的过程,较为深入地涉及到了教育公平、城市接纳等问题。一连串沉重而苦涩的成长困境在一种有节制的叙述之后,总以“光明和希望”收尾,带有逻辑合理、价值正确的理想色彩。她的长篇小说《如画》让外来务工人员孩子返回农村,看到了“新农村”的新变和希望。刷刷的长篇小说《幸福列车》让农村女孩杜鹃看到了城乡互动下的美好未来。王一梅的纪实文学《一片小树林》简洁流畅地描述了乡村小学校长杨瑞清二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和建设。胡继风的短篇小说集《鸟背上的故乡》以群像的方式刻画了农村留守与流动儿童的不同遭际。尤其是王巨成的长篇小说《穿过忧伤的花季》,以留守初中生为主线,通过邻里社群、校园生活、同伴关系等的刻画,构建了一幅幅真实细腻的乡村图景:无人照料的濒死老人,被性侵的女孩,偷尝禁果的少男少女,欺行霸市的混混帮派,龃龉斗气的乡邻与村落,缺少交流的打工家庭关系,简单粗暴的师生沟通方式。老人去世,孩子们随父母进城打工,新一轮的背井离乡再次上演。乡村的沙漠化、空壳化,留守儿童成长的无助与撕裂,立体而真实的凸显出来。

从不胜枚举的当下儿童生活作品中可以看到童年观念的变迁,儿童文学创作从“居高临下”式的教育、训诫儿童,转向了“平视”视角中对儿童和童年生活的尊重。一方面,从当代儿童的立场和视角,较为轻松幽默、零距离地描述儿童的日常生活,既是对长期以来被漠视的儿童生理和心理真实状态的充分认可,极大满足了特定年龄段儿童的阅读需求与认同感,也反映了儿童文学对自由感、娱乐性等审美功能的召唤。另一方面,童年生活的丰富性、多元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尤其是占据中国未成年数量33%的留守与流动儿童的生活状况,成为青年作家乐意涉及的选题。这既与他们多生活于基层,对农村留守与流动儿童的生活境况比较熟悉,有较为充分的素材和资源,也与主流评奖体系对这一题材的推进、扶持有很大关系。

2. 探寻儿童成长的深度

新世纪前后,江苏青年作家对当下儿童成长的心灵史有着更为深入的认知和判断,对时代进程、社会环境、教育体制所带来的儿童的心灵变异、成长困境有了更敏感的认知、更深入的体察和更精微的叙述。

韩青辰是位非常有特点的青年作家。她对儿童人性的透视、心理的剖析、主体性的深度书写,都显现出难得的清醒和执着。她的中篇小说《龙卷风》,长篇小说《小证人》《因为爸爸》,纪实文学《飞翔吧,哪怕翅膀断了心》等,所选取的主题人物都是不太“讨巧”的类型:因不堪学业压力而自杀的高中生、抑郁症家庭、网瘾少年、聋哑儿童、艾滋病患儿、职业小乞丐、烈士遗孤、在命案中需要自证清白的“污点证人”……正是这些“特殊”的未成年人,他们所遭遇的挫败、苦难,包括他们无法修复的未来、惨烈的命运,都在提醒我们儿童作为世界的一部分,除了明亮的希望和欢愉外,也承受着世界带给儿童在内的所有人的碾压。“我看见我十三年的生命完完整整躺在妈妈写满安全指南和学习计划的玻璃罩里!我认识的人差不多都是名师,我是性能超强的学习机,一度我的排泄物都带有印刷物的铅灰味

儿!”“这个城市每隔一段日子就有一个懦夫和混蛋像肖依那样跳楼身亡,我不知道他们死给谁看,其实人们早已审美疲劳,都懒得饶舌。”(《龙卷风》)语言不只是技巧、形式,它和内容一起成为艺术的本质。约翰·史蒂芬斯在《儿童小说中的语言与意识形态》中强调:“很难想象一个叙事是没有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借由语言生成,并且存在于语言之中。……而叙事本身就是由语言构成的。”^[1]韩青辰对儿童主体性的着力开掘,对外部社会环境造成儿童的剧烈心理危机的严肃探寻,蕴含着斗士参孙的悲怆。这在江苏乃至全国儿童文学界,都有着特别的意义。

3. 历史深处的童年想象

无数代人的童年记忆都留驻在古老中国的广袤大地上,和一方水土有着千丝万缕的情缘,承载了现代人关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喟叹。更有作家摆脱私人性的童年生活记忆、审美趣味的笼罩,延伸到历史深处,书写“历史中的童年”。在时间长河的摆渡中,以儿童的目光凝视那些充满“江苏”地域特色的生动人物和风俗画卷。在个体生命体验的基础上,升华为更紧实、开阔的故事结构,更具有高度的童年精神。

从《漂来的狗儿》《艾晚的水仙球》《黑眼睛》《星星索》《童眸》到《遥远的风铃》,黄蓓佳绘制了童年成长的图谱。而这段带有极强时代性的童年生活,打上了五六十年代鲜明的烙印,也是黄蓓佳个体成长的自我印痕。这使得相关作品的人物性格、生活场景、民俗节庆、风物与细节显得异常细腻动人。

黄蓓佳对童年史诗的拼图,不仅从她本人的成长经历下延到新世纪的儿童,更上溯到民国时代。结合“五个八岁”系列长篇小说,黄蓓佳将百年中国的童年生活放置在特定的历史节点上:民国初步实现统一和安定的1924年(《草镯子》),抗战即将结束的1944(《白棉花》),文革初期的1967年(《星星索》),刚刚恢复高考的1982年(《黑眼睛》),以及网络时代的2009年(《平安夜》)。然而,在这些显著的历史节点中,梅香、克俭、小米、艾晚和任小小都没有应和着历史节点,成为某个时事所造、应运而生的时代小英雄。梅香还沉溺在与秀秀一起装扮洋娃娃的游戏中,克俭在伶牙俐齿的两个姐姐面前拙于表达,小米对爸爸被批斗游街已经司空见惯,被哥哥姐姐光环遮掩的艾晚显得毫不出众,任小小已经在父母离异、外公外婆离异、爷爷再婚的复杂家庭关系中游刃有余。

黄蓓佳从日常生活的声响、气味、纹理中,敲击着个体的感官。历史的重要节点所形成的宏大景观与个体独自承担的生活细节,形成了彼此的互文:历史的重量与每一个个体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日常生活承接着历史变迁所释放的能量,并以燎原之势反作用于宏大叙事,它的真实和无孔不入甚至还会形成巨大的惯性。因此,如何看待百年中国中的童年生活、谁又具有百年中国儿童的典型性,黄蓓佳给出了一份很不一样的样本。梅香不像叶圣陶的“稻草人”、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中的阿丽思,无能为力地注视着中国农村惨相;克俭不具有《大林和小林》的阶级意识与价值判断,更没有像“三毛流浪记”那样颠沛流离;小米没有成长为“小英雄雨来”“小兵张嘎”式的小战士,而是个迷恋小人书、热衷玩溜铁圈的寻常男孩;泼辣能干的艾早、学习能力超强的艾好,以及平凡的艾晚都和《班主任》中的谢慧敏完全不具有可比性。即便是《童眸》中流氓习气很重的马小五,也与《班主任》中的宋宝琦无法并置。正如黄蓓佳在《童眸》后记中引用的奈保尔的那句名言:“生活如此绝望,每个人却兴高采烈地活着!”黄蓓佳放弃了某种整饬的典型性,揶揄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凌空蹈虚。她笔下的儿童是脆弱、稚嫩、懵懂的,他们不是被历史选择的关键人物,不是时势所造的英雄,不是随着一个严密精致完整故事的演进而横空出世、光芒四射的宠儿。他们的童年生活在历史细微处,有着命运弄人的

[1]约翰·史蒂芬斯:《儿童小说中的语言与意识形态》,张公善,黄惠玲译,〔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不测、时代潮流的无奈、历史趋势的卷席,却始终葆有着明亮、率真、纤弱、柔韧的生命体验。这是黄蓓佳对百年中国童年历史的深情回眸。

相比较于曹文轩、金曾豪对童年回忆的耽迷和自矜,新世纪以来的童年回忆带着“逝者如斯夫”的感伤,构成了新世纪童年回忆式书写的基调。对旧时光中童年生活、民风乡俗、传统文化的再三致意,是新世纪城市化进程背景下的一种“幽趣”。祁智的《小水的除夕》《羊在天堂》等小说,以及与之构成互文效应的散文集《一星灯火》,从中可以看到祁智不遗余力地用男孩小水的视角复原“物象”中的原乡:四季风华、天赐芦苇、棣上人家、十字街口、理发店、浴室、车站,以及当地的土特产。许多已经消失了的物象,在岁月的记忆场景中不断闪回,在心情和情绪的弥漫中不断出场,被作者执着而又深情地记载在文本里。这些构成精神原乡的场景、情绪都指向作者的童年生活。祁智对这片真实又虚妄、美好又不可逆的失乐园的竭力复原,也是对曾经的懵懂少年的追溯和复原,更是对元气淋漓的儿童精神的再三致意。在这个意义上,《小水的除夕》不只是一个滞留在过去时空中,自足封闭、缥缈不可及、不与当下发生关联的失乐园。“童年”抚摸了过去,照亮了当下,并将零碎而炫目的过去融入到当下,汇成了存在的关联性、连续性。正是在这一不断建构的童年精神的“过程性”中,在寻求童年旧时光与当下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审美定位中,生成了文本的张力。审美机制看似是由文本内部生成的,而根本上是由社会和文化的整体语境共同构成的——现代化进程中失落的故乡、成人作家和读者无处安放的精神家园,都使得作者渴望儿童读者理解并悦纳这一突然变得遥远的乡愁。

4. 幻想类题材的崛起 幻想是儿童文学的重要特质,是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重要的艺术生长点。第五届(2000年)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江苏获奖作品是王一梅的短篇童话《书本里的蚂蚁》,表明以低幼童话为首发阵容的幻想类作品开始进入“文学”视野。此后,童话、少年幻想类小说等面向不同年龄段的作品开始层出不穷。郭姜燕、顾抒、赵菱等更年轻的作家不断汇入到新世纪以来的幻想类文学创作中,形成了多元共生的发展面貌。

王一梅曾在幼儿园工作十余年,与幼儿生活的无缝对接,使她非常熟悉儿童的精神世界。比如她的早期代表作《书本里的蚂蚁》一开头是“古老的墙角边,孤零零地开着一朵红色的小花”,儿童的稚嫩和墙角的“古老”相互辉映,生成了奇异的反差。蚂蚁的天真率性与旧书的刻板凝滞也构成了冲撞,让“新故事”的出现变成了奇妙的遇合。《给乌鸦的罚单》《屎壳郎先生喜欢圆形》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滑稽感;《树叶兔》《胡萝卜先生的胡子》想象曼妙;《蔷薇别墅的老鼠》《洛卡的一年》中生命哲思的诗意,生成了低幼童话的艺术美感和童年趣味。她的长篇童话《鼯鼠的月亮河》《住在雨街的猫》《恐龙的宝藏》《木偶的森林》,有着精心设计的结构、温情而不失幽默的语言、哲理与游戏互补的情节、开放式的结局,以及“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的生态意识。这些构成王一梅独具特色的低幼童话风格。诚如朱自强评价其作品“可以用以标示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作品所达到的一定的艺术高度”^[1]。

赵菱《父亲变成星星的日子》《故事帝国》等长篇童话作品专注于想象力的幻化。顾抒的短篇童话《布若坐上公交车走了》在想象力的多次尝试和现实的多次追寻中形成有趣、有张力的文本实验。郭姜燕的《布罗镇的邮递员》中,少年信使阿洛来往于人类社会和黑森林之间,开启了一段时空里的奇遇。阿洛的信使身份赋予了儿童改变历史现状的巨大信心,但是对这一可能性的书写,郭姜燕是非常节制的,平凡少年阿洛对小镇和森林的探索,既是积极主动的,又是谦卑友善的。童年生命状态与自然生态意识,融洽地奔驰在郭姜燕的写作里。布罗镇和森林,从彼此对立,到相互接纳之间构成的张力、缝隙和弥合,使这个童话文本具有较强可读性的同时又达到了的一定的深度。尽管少年阿洛的信

[1]朱自强:《寻找家园——评王一梅的〈木偶的森林〉》,〔上海〕《文学报》2005年9月1日。

使之旅不乏有“集体期待”的被裹挟意味,各司其职的人物形象、充满必然性的情节设计难脱童话创作“类型化”的窠臼,但是平凡少年阿洛找回了人类失落的生命家园。这不仅关乎想象力、童话品质,更是一种比一般环保或生态意识更为深刻的“命运共同体”的理解,令我们对未来世界充满期待。

新世纪以来江苏儿童文学年轻作家对新的创作方式、叙事结构、审美形态有着创新的锐气,尤其显现在少年幻想类作品的创作中。这一类型文学作品具有时尚性、娱乐性、消费性和原生态性的特点,获得了拥趸的狂热喜爱。如顾抒的《夜色玛奇莲》系列,将困扰人心的妒忌、孤独、虚荣、贪婪等欲望,隐喻为各种“兽”。正邪混杂的捕兽人群体,通过悬赏、豢养、培育新品种的“兽”来控制世界的资本大鳄……这个二次元的世界无疑是现实世界的镜像。少女毛豆和她的朋友们与吞噬他们内心的“兽”不断抗争的过程,也是其心灵不断被救赎的过程。顾抒对叙事策略、故事结构、语言表现力、氛围营造都做了用心的努力。在《白鱼记》系列中又将这一精致处理细节的方式运用于中国古典风范的构建中。

少年幻想文学的异军突起,以其独特的意义参与到儿童文学乃至社会文化的重塑过程中。它敏锐地鼓励着、纵容着新的创作方式和审美形态,又被牵制在喜新厌旧、始乱终弃的市场机制中。它有可能形成类似“亚文化”特征的读者群落,削弱现实空间中自我与他者的真实对话,但不得不承认,它为江苏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艺术新变、储备作家后备力量的一种可能。

四、结 语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江苏儿童文学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儿童文学发展提供了新题材、新人物、新的艺术经验;拓展了童年观、儿童生活内容、儿童心灵版图、儿童面对自然万物的“世界观”;形成了较为充足的创作梯队,良性循环的市场机制和读者接受氛围。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界、出版界和教育界对面向儿童的阅读推广活动愈加重视,儿童文学的传播与接受成为社会文明进程中的独特文化风景。与此同时,对国外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引进、对儿童文学评奖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点。作家、作品、出版社、期刊、读者的良性互动,生成了江苏儿童文学丰厚的人文环境和读者接受氛围,也形成了由创作者、出版者、购买者与消费者构成“童年消费”到“消费童年”的市场网格。这既是儿童文学繁荣的重要契机,但也带来了一些作家俯首于市场导向、献媚于儿童趣味的写作姿态。

在儿童文学高度市场化的今天,相较于全国各地儿童文学创作的多元态势,江苏儿童文学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儿童散文、儿童诗歌、儿童寓言等体裁的创作力严重不足。儿童文学理论批评队伍较为薄弱,尤其是当下超大的阅读量增加了不同研究者对文本评价、整体性研究、理念对话的难度。儿童文学作品多样性在满足不同年龄、类型读者的审美需求的同时,更需要谨慎对待作为“文化产品”背后的意图和效应,更需要检讨作为江苏原创儿童文学的品质。尤其一些年轻作家文学素养准备不足、文化视野偏狭,在流水线式的出书进度中,未能在面向儿童、面向未来的格局意识下思考童年精神,导致在儿童文学观念的更新、童年书写的艺术难度、文本本身的试验与探索等问题上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江苏儿童文学面临着走出小格局,走向艺术品质、文化境界全面提升的关键期。年轻作家应该在汲取中外儿童文学经典作品艺术营养的过程中,生成更具辨识度的艺术风格;在童年精神召唤下展现江苏特色语境下童年故事的创作自律、艺术自觉、文化自信。

〔责任编辑:平 啸〕